



茅盾文学奖研究

Maodun Wenxuejiang Yanjiu

任东华 著

茅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研究

Maodun Wenxuejiang Yanjiu

任东华 著

茅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茅盾文学奖研究/任东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004-9741-7

I. ①茅… II. ①任… III. ①文学奖—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6932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周 昊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75 插 页 2

字 数 415 千字

定 价 5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茅盾文学奖研究”，一个诱人的却又是复杂的，一个需要时间沉淀的，却又是不能永远等待下去的重要文学研究课题！现在，终于有了任东华这部专著问世了！此前也有过几本专题著作出版，且不无筚路蓝缕之功，但惜乎主要是相关作家作品论的一个合集形式；而任东华的这部著作则不同，它称得上是比较深刻的、系统的、科学的综合研究，应当说，它是一部整体性地站在文学生产制度、文学思潮起伏和审美意识发展的高度上，全面研究茅盾文学奖的具有相当分量的学术著作。

自1981年根据茅盾先生的“遗嘱”设立茅盾文学奖以来，似乎就注定了这个奖项的不平凡和不平静，不仅由于茅盾先生在当代文学界的权威地位，也由于中国作家协会一直是把它作为全国性的权威性的文学大奖来操作的。近三十年来，茅盾文学奖已经评选了七届，尽管饱受争议，各种评价也表现得千差万别，甚至是针锋相对，但实事求是地说，茅盾文学奖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奖项，细加寻味，还会感到，它毕竟还是把相当一批出类拔萃的作品纳入了进来。不过，也无须讳言，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茅盾文学奖也错过了一些优秀作品，从而招致了不少非议和批评。但不管怎样，茅盾文学奖都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 and 不可避免的重要文学现象，它缩影般地基本反映了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复杂发展的面貌，当然主要是长篇小说的创作面貌。因此，无论是就提升中国文学的形象，还是就加强与世界文学的联系而言，对茅盾文学奖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任东华曾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他于2004年至2007年在兰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出色地完成了博士学业。进校不久，任东华就选定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茅盾文学奖研究》，从此没有动摇过。也许这是他早就立定的志向，也许与我这个具有中国作家协会背景，参与过多届茅盾文学

奖的组织工作，并且担任多届评委的导师也不无关系。对他的选择我始终支持。任东华为人诚恳、朴素、踏实，能吃苦，勤于钻研，理论功底厚实，知识储备也较充分，对于最前沿的学术动态，他往往敏感先得，对于自己的课题，他肯下硬功夫步步为营。为了写好这部著作，他历时七年，不但大量阅读了近三十年以来有影响、有成就的长篇小说，还多次精研获奖的原著，并从另外一个角度参与了我主持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1978—2000）》的前期部分工作，这样使他既非常熟悉文本，而且还获得了比较广阔的文学史视野。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为了深化茅盾文学奖研究，他常驻北京两年，天天跑国家图书馆，以至于工作人员都熟悉了他。在此期间，我们常有机会见面，就某些问题进行过严肃而热烈的学术讨论。后来，他又去做了博士后。在研究过程中，他充分地利用各种机会采访与茅盾文学奖相关的当事人，下大工夫尽可能多地搜集公开的或者内部的资料。因此，对茅盾文学奖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资料的占有上，还是在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条例”、“评选标准”、“评选过程”、“思想内涵”、“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以及“经典观”等义域的深入程度上，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在对茅盾文学奖的乡土意识、现实书写、历史叙述、现代转型等文学现象的解读方面，也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独立精神和创造的勇气。他通过比较茅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也相当深刻地证实了茅盾文学奖并非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实在没必要厚彼薄此，矮化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同时，他又通过文本细读，详细地阐述了某些作品的成功所在，大胆预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些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争议和影响，也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了茅盾文学奖。

鉴于过去对茅盾文学奖的研究基本上采取的是“社会—历史”方法，也表现了比较突出的陈陈相因的局限性，这部专著的研究方法借鉴了接受美学和 M. H. 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种坐标的观点，以及韦勒克和沃伦倡导的文学分类研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理论，遵循方法选择及其运用的“还原”、“总体性”和“辩证地批判”等基本原则，采取“综合—创新”方法对茅盾文学奖进行跨对象、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研究，力求从多个层面对茅盾文学奖及其作品作出丰富的阐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认为，这部论文虽然对茅盾文学奖制度层面、评奖得失、获奖作品的历史价值作出了较为详细、深入和独到的研究，但其最大努力点乃在于

提出了“茅盾文学奖美学”这一概念。当然，茅盾文学奖是变动不居的，由经常变化的评委组成，每届评奖的结果也不无偶然因素，换一批评委，结果也许就不一样，所以它有没有自己稳定的“美学”是一个问题。然而，多届茅盾文学奖形成的审美积淀，比如侧重重大题材，讲究厚重感，倾向开放的现实主义，确也是存在的。正因为这样，作为一家之言，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茅盾文学奖美学是一个总体的、开放的、动态的概念，是由当代文学生产制度、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理念及历届的获奖作品从“制度—美学”、“文本—美学”和“比较—美学”等层面共同形成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茅盾文学奖主要通过题材的倾斜呈现、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之精神主潮，以及“全知视角”、“正面的价值取向”、“新现实主义”和“史诗传统”等具有原则意义的“基本叙事”因素和共通的思维精神——构成了茅盾文学奖美学的“基础”，各种因素均处在不同层次的系统中，彼此发生着深刻的联系；尽管在原则与精神方面，茅盾文学奖有着某种相对稳定的延续性，但每一届的获奖作品却是变化的，因此，茅盾文学奖美学也是与时俱进并融会贯通的，它既有着传统的血脉，又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思潮、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及当代文学创作的美学合力之呈现；尽管它还是不成熟的，有着各种不足甚至缺陷，但在主要方面，它在不断地对话与交流中努力建构自己的诗学特色，也在不断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传统的和谐美学建设及中华文化与文明建设，并循序渐进地走向华语性、人文性和经典性。作者谦虚地表示，上述对茅盾文学奖美学的概括和梳理，仅仅只是尝试着打开了茅盾文学奖研究的美学之门，以期抛砖引玉而已。如是，这一评价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

概而言之，该著对“茅盾文学奖”的外部与内部、部分与全局、要素与系统、成绩与局限等均作出了突出的开拓和创新，值得赞许。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如文风平直，稍失生动，批判力度欠弱，对茅盾文学奖美学某些观点的解释也不够清楚和深入，缺乏说服力，等等。然而，瑕不掩瑜，《茅盾文学奖研究》一书对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无疑具有值得大力肯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和理论启示意义。

是为序。

雷 达

2011年3月6日

目 录

序言	雷 达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茅盾文学奖研究的意义	(2)
第二节 茅盾文学奖的研究方法	(6)
第三节 茅盾文学奖研究的基本设计	(9)
第四节 茅盾文学奖的研究现状及反思	(16)
第二章 茅盾文学奖的“制度—美学”	(27)
第一节 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	(28)
第二节 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	(38)
第三节 茅盾文学奖的“思想内涵”	(51)
第四节 茅盾文学奖的“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	(63)
第五节 茅盾文学奖的“经典观”	(76)
第三章 茅盾文学奖的“文本—美学”(上)	(87)
第一节 茅盾文学奖的“题材类型”	(88)
第二节 茅盾文学奖的“精神主潮”	(101)
第三节 茅盾文学奖的“叙事特征”	(124)
第四节 茅盾文学奖的思维形式	(140)
第四章 茅盾文学奖的“文本—美学”(中)	(152)
第一节 茅盾文学奖的“乡土意识”	(152)
第二节 茅盾文学奖的“现实书写”	(165)

第三节	茅盾文学奖的“历史诗学”	(183)
第四节	张洁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	(201)
第五章	茅盾文学奖的“文本—美学”(下)	(219)
第一节	《平凡的世界》:多重冲突与价值取向的深层构型	(220)
第二节	《白鹿原》:“悲剧意识”与“本色人生”的交互变奏	(232)
第三节	《长恨歌》:生命的蝉蜕与发现	(243)
第四节	《张居正》:穿越“史诗”之门	(256)
第五节	《尘埃落定》:心灵的力量及其想象诗学	(269)
第六章	茅盾文学奖的“比较—美学”	(283)
第一节	茅盾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之比较	(285)
第二节	迟子建文学创作的“世界性因素”	(298)
第三节	民族书写与世界意义	(321)
第四节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想象	(339)
第七章	茅盾文学奖美学的经验及未来	(353)
第一节	茅盾文学奖美学的经验与批判	(353)
第二节	茅盾文学奖美学的文化逻辑	(359)
参考文献		(365)
后记		(385)

第一章

绪论

2006年12月27日，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在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的“东方讲坛”上进行城市文学讲座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最近有记者问我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等言论的看法，还有的问我对于网上流行的‘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中国作家已经死亡’、‘中国评论家已经死亡’、‘中国文学理论已经死亡’、‘中国教授已经死亡’等‘十大死亡’的看法。这被称为‘垃圾论’和‘死亡论’。顾彬的话后来有所澄清，但主要意思还是清楚的。问题都提得非常尖锐。我觉得下一个‘悼词性’的整体否定的结论也许比较容易，而我更欣赏的是一种分析的态度，一种能就具体问题提出真知灼见的批评态度。我希望尽可能多看原作，在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品性的基础上再去下结论不迟。其实这些激烈的言辞里不无合理的成分和某些严酷的真实，也涉及了当前中国文学面临的危机问题。”^①

把这段话移植到茅盾文学奖来，我觉得也非常恰当。每届评奖所搅动的是非与争议，都使茅盾文学奖陷入舆论的旋涡中不能自拔。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对于困扰着茅盾文学奖的关键性难题却少有触及和有效解决。如茅盾文学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有什么样严肃的学术意义，研究方法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创新？这些不断增加的作品能熔铸成可以概括的美学特色吗？已有的研究处在何种层面，存在着多少“黑洞”与“空缺”？

显然，它们考验着研究者的学术勇气和眼光，无疑也开启了茅盾文学

^① 雷达：《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解放日报》2007年1月22日。

奖研究的美学之门。

第一节 茅盾文学奖研究的意义

近些年来，随着文学的日益边缘化，它昔日的风光与辉煌已经不再。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文学像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正在死亡”。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学依然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执著地书写着当代人的精神旅程。正如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

它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它在广泛的危机中还是找到了不少机遇，而不是在“炒作”或“冷遇”中倒下；它在默默的耕耘中掀开了新的一页；不再为制造轰动而狂躁不宁。我们注意到，文学不太可能大起大落了，它将维持一个基数，它的显在影响或者在缩小，而潜在影响却会通过自身或者替身，越来越大。^①

尽管商业策划或者市场炒作使不少的文学作品在虚假的繁荣中不断地泡沫化，但也有不少论者认为，某些文学作品会在时代的淘洗中越来越彰显出它的高贵与深厚的人文素质，如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茅盾文学奖甚至力图成为当代文学的一面“旗帜”！姑且不论它在纯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之间如何摇摆，仅就它的实绩、对当代文学及其历史的影响、所聚焦的文学创作之探索及其成败得失、所代表的当代文学的世界形象及其进程、对中国形象及民族灵魂的重铸所体现的担当性以及文学制度的实践而言，都成为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存在；甚至，它也是当代文学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窗口或者平台，通过茅盾文学奖，我们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步入冲突不断而又动荡不宁的当代文学之堂奥。从这个方面来讲，茅盾文学奖值得我们进行严肃而深刻的研究。

从文学制度来看，茅盾文学奖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的“最高文学奖”、“第一文学大奖”或“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不管这些称誉有没有“言过其实”，就其对当代社会与文学的影响而言，与其他文学奖项相比，无疑

① 雷达、任东华：《新世纪文学初论》，《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是最大的。

其实，以文学奖的方式来引导或推动文学的发展，肇始于1936年的“大公报文艺奖金”，后来，这种“形式”得到仿效或推广。在现代文学史上，较著名的文学奖还有，1945年为纪念茅盾“五十寿辰和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文艺杂志社”与“文哨月刊社”联合举办了“茅盾文艺奖金”征文活动。^①新时期以来，文学奖的设置更被有意识地纳入到文学生产机制之中，如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等，它们成了茅盾文学奖的前奏与基础。

1981年，茅盾决定捐出他的所有稿费25万元人民币，委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设立茅盾文学奖。由于茅盾在新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及声誉，以及举办者“中国作协书记处”的高规格，“全国性”的性质定位及其后来非同一般的评奖实践，使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的最高文学奖，而研究茅盾文学奖，对于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产制度也有着深刻的示范意义。茅盾文学奖研究还包括系列性的非文学性的问题，如新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渗透与调控；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创作的立场与操守；国家文化政策和管理措施对文学的传播过程、利润追求及其批评之影响，对文学教育体制、文学消费趣味和能力之形成的推动作用；娱乐文化、消费社会及跨国资本对“人”的渗透；以及如何保持自己的精神意识等。^②

茅盾在“遗嘱”中特别指出，茅盾文学奖是为“繁荣长篇小说创作”而设置的。对于茅盾本人和文学奖的举办者——中国作协书记处以及当代文学评论界而言，长篇小说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体裁”。他们认为，长篇小说不仅有着巨大的艺术容量，甚至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代名词，它不仅包括诗歌、散文、戏剧、音乐以及其他种种文学因素，而且还涉及文学的真实性、典型塑造和文学的形式美等方面，因此，借长篇小说“一斑”几可窥文学“全豹”。同时，长篇小说的最高形式被普遍认为是“史诗”，能够“对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风貌全面反映”。这种小说观念曾经内在成为当代写作之“魂”，甚至还潜在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文学主潮。长篇小说以史诗形式反映时代的发展、人类精神的嬗变及当代中华民族灵

^① 参见唐金海、刘长鼎主编《茅盾年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706—721页。

^② 参见王晓明《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魂的重铸等，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以至于长篇小说被视为“一个国家文学实力的标志”。茅盾文学奖作为当代“最优秀”长篇小说的奖项，尽管在七届评奖实践中有着各种不足或“误差”，甚至还遭到了极为激烈的批判，但还是被认为基本上反映了近三十年的文学事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因此，研究茅盾文学奖并评价它的文学史价值，对于重新评价当代文学，促进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实现文学与现实的关联，以及如何摆脱当前的种种困境，有着非同一般的启迪意义。

茅盾文学奖广泛地反映了近三十年文学的坎坷与曲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开放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茅盾文学奖美学。就评奖标准而言，无论从思想还是艺术上，茅盾文学奖都主张“多样化”与“百花齐放”；而且市场经济、文学的边缘化及其本身的审美特质等因素也使茅盾文学奖充满内在的“张力”；然而，茅盾文学奖又并不是“民间的”或者“纯文学”的，它的“半官方”身份使它既受到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政策及当前主流政治等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明确的“社会主义文学”性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弘扬主旋律，尤其重点关注“深刻反映现实生活，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同时又受到中国人长期的审美经验、具体的评奖实践和当前现实之需要等因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其总体性、发展性和概括性的美学特征。那么，茅盾文学奖包括什么样的内涵，对当代文学的创新及与文学史的关联性如何，反映了近三十年长篇小说怎样的艺术高度、独创性和某些普遍规律，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具备怎样的基础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与总结的。

研究茅盾文学奖也有利于提升中国文学的形象，加强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当前，在全球化的境遇下，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既剧烈，又多样化。在亨廷顿看来，中华文明（实际上指中国）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大的差异性，而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将是由中华文明（或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引起的。为了应对这种危机，各个国家纷纷制定了自己的文化安全与建设战略，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

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① 要实现此举，文学至关重要。雷达认为，当前文学“亟需从正面影响人、塑造人、建构人的精神能力，亟需呼吁爱、引向善、看取光明与希望的能力，亟需明辨是非的能力”。^② 茅盾文学奖作为主流文学，作为倡导这些正面价值的“典范”，确实值得关注。通过学术研究既可以促进茅盾文学奖的推广与发展，又可以提升当代文学的整体形象与实力；在全球化浪潮中，通过与其他文学的比较研究，还可以增强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和交流，促进茅盾文学奖和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

通过茅盾文学奖，可以使我们从制度、作品到文化对当代文学研究进行本体反思。当前，对茅盾文学奖众说纷纭，究其缘由，主要是对茅盾文学奖缺乏客观的评价，或者过度抬高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地位，认为它有着价值的“永恒性”，永远不会贬值，忽略了茅盾文学奖某些作品的“历史性”和它们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或者过度贬低茅盾文学奖的文学价值，认为它是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产物，与“纯文学”无关，并随着文学的边缘化正在趋于“速朽”；还有的论者把茅盾文学奖“娱乐化”，以耸人听闻的评价或者貌似揭秘的“内幕”文字进行歪曲或遮蔽，使之失“真”。同时由于受到方法、观念、视界等因素的影响，茅盾文学奖研究至今尚未完全成熟。这些其实也反映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某种缺失，如缺乏理性，缺乏对学术研究基本标准之自觉认同，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肃态度，缺乏对研究对象生命式的感悟与理解，缺乏对古今中外文学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缺乏对当代文学研究进行本体性反思的能力，缺乏把学术研究与现实联系起来的自觉与勇气，等等。通过对茅盾文学奖的研究，我们期待在这些有关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上取得有意义的突破。

在当代文学的汪洋大海之中，茅盾文学奖是一颗闪亮的水珠，通过对它的研究，不仅期望能更全面地催放它的光华，而且我们还期望通过它发

① 胡锦涛：《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文艺报》2006年11月11日。

② 雷达：《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一个发言提纲》，《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

现并解开当代文学的某些症结，从而促进当今中国文学的繁荣并走向世界。

第二节 茅盾文学奖的研究方法

作为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尽管从文化、制度到精神等方面牵涉着当代文学的整体变迁，以“弘扬主旋律”对当代文学进行着潜在而深刻的导向，并因之成为当代社会突出的、具有风标意义的“文学—文化”现象，但茅盾文学奖研究却遭遇诸多尴尬，这既表现在对茅盾文学奖作为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的研究还处于学理层面的断裂地带，更为基础和关键的是评论界和学术界对茅盾文学奖的审美机制、价值构成及作品解读等方面的研究，还基本依赖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而忽略了其他方法的参与，尽管这种批评方法对于文学在当代社会的存在意义、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及其变化、文学的经典意识与经典标准的设置，以及文学的认知价值等都作出了合理而深刻的阐释，由此巩固了茅盾文学奖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的崇高地位。但在对茅盾文学奖研究的过程中，西方文论却“失语”了，而由传统的审美规范、话语方式及概念范畴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研究模式，如在内容上依据是否“全面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真），在艺术上是否具备“史的纵深感和厚重感”和浓郁诗情典型化合的史诗结构（美），以及作者表现出怎样的价值取向（善），等等，使方法本身硬化，同时也使茅盾文学奖的丰富内涵与义域被强制板块化。由此，茅盾文学奖研究急需从多个维度进行方法创新与实践。

自19世纪末以来，“现实主义”备受质疑并经历了被边缘化的多重危机，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方法热”中还承受“过时论”的强烈冲击，作为现实主义的典型文本，茅盾文学奖也被诸多研究者及其各类文学史所冷淡与拒绝。面对如此难题，我们该如何进行研究方法的选择？接受美学认为，任何一个文本或一种文化现象，在现实中都是一个独立自主但“有待完成”的“召唤结构”，创造主体用想象构建起对象的意义框架，但却留下巨大的、期待着“读者”与它交流互动的“空白地带”，通过读者的“二度创造”完成自身的主体化，所以，读者、情境或对象的任何“换形”，都会导致文本意义的重构与颠覆，从而也会相应地呈现作品的“复调化”，也就为研究者的学术阐释拓展了源源不断的“意义空间及其资

源”。茅盾文学奖作为当代“文学—文化”所包容的诸种现实矛盾、审美观念、精神冲突和文学形式等现象的聚焦点，正具备着这种阐释的深刻化和复杂化的对象功能。M. H.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为我们确定了“艺术批评的诸种坐标”，即作品、艺术家、世界与欣赏者四种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文学研究的坐标系；韦勒克与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则进一步把它们分成“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前者包括文学作品的声音、意象、象征、形式和评价等层面，后者则包括文学与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及其他艺术等层面。可以说，这些理论为我们有效地进入茅盾文学奖提供了技术支持和艺术“通道”。就茅盾文学奖本身而言，潜在的史诗规范使获奖作品都倾心于“复杂呈现”，即审美对象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军事、社会心理、时代精神、历史倾向”等方面的“全景情结”。巴赫金在面对“宏阔、精深、博杂”的研究对象时曾说过：“对精神现象需要的不是解释其因果，而是‘理解’，这种‘理解’是我作为‘我’要同作为主体的‘你’进行‘对话’。”^①所以，方法不是研究者对对象的“强加”或“阉割”，而是对象自身的生产、投射和容纳，它既可能深入、广泛地为研究对象“去蔽”，让我们领略对象的丰富性的“内涵”，但也可能让对象永远无法“完整”，并使自己产生艺术变形。

为避免方法与对象的双重误置，我们在研究茅盾文学奖时，也尝试着遵循方法选择与运用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还原原则、总体性原则、辩证地批判原则。

(1) 还原原则，即把茅盾文学奖还原到它所产生的历史情境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学情境。由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周期原则性地限定在4年的时段之内，没有“间隔”的审视距离，使茅盾文学奖既典型地体现了时代对文学的基本要求，也很难避免时代所赋予的审美、意识形态与意义之类的局限，随着历史情境的转换，文学标准的“新陈代谢”，茅盾文学奖的原义或被遮蔽、或被剖析、或被更换。因此，返回历史情境就不仅是钩沉原义与当下“对话”，同时还要梳理茅盾文学奖被曲折造型的内在脉络、动因和策略。可以说，这是对茅盾文学奖进行意义拓展，使它复杂化而获得充分的被诠释权。同时，我们又不能把茅盾文学奖人为地“化为”社会学文本、政治学文本或者其他“学”文本，而是要在想象中抽去它的非文

① [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卷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

学负载，用普遍的审美标准来核定茅盾文学奖的文学性价值。还原历史与文学，可使我们对茅盾文学奖和当代文学的命运担当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

(2) 总体性原则。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把总体性描述为事物的规定性，它统括事物的部分与整体、要素与系统等关系，在长期的操作过程中，茅盾文学奖也框架性地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它使获奖作品的意义在其中层次性地呈现。在文学奖的视界中，既包括作品内部的审美因素因参考标准的转换而此消彼长地重构，也包括作品之间因各有侧重的文学呈现所召唤的审美“互文”，还包括在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对茅盾文学奖在现代性、想象力、思维特征、价值取向、形象性等文学质素方面进行总体的审视，茅盾文学奖以此彰显其审美特征的自足性和独特性。

(3) 辩证批判原则。反思构成了创新的前提，对茅盾文学奖这个文学的“庞然大物”，在弃除“盲视”与“偏见”之外，我们也决不迷信并以当代文学发展所呈现的诸多问题作为支点和参照，深入地质疑茅盾文学奖种种先验的原则、规范和程序，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不合理之处进行观念与理论的批判；警惕叙事成规对问题的压抑，如波普尔所说：“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正是问题才激励我们去学习，去发展我们的知识、去实验、去观察”^①，在不断的提问过程中实现茅盾文学奖自动地“浮出审美的地表”。同时，为防止陷入主体的绝对判断或片面性，批判性思维也要反观茅盾文学奖，从多个维度检测、反思与批判本身的合理性，破解因追求茅盾文学奖的总体性所导致的“误区”。批判的最终目标在于建立研究者的主动思维，以实现茅盾文学奖乃至当代文学的审美创新工程。

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开始有意识地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文学研究的突破，所以，无论是古典文论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还是西方文论层出不穷的“主义”批评，都曾各领过“风骚”，但正如刘士林等人对“85方法热”所反思的那样，由于缺乏“融会贯通”，在凸显研究对象的部分的审美品格时，无疑是以牺牲事物的整体性和正当性为代价的。对此，学者们在新时期之初就有所反思。1982年，王元化根据自己研究《文心雕龙》的经验，最先提出文学的“综合研究”方法。从后来的研究实践及理论拓展来看，“综合研究”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范型。它的

^① 转引自罗慧生《西方科学哲学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基础意义是指与分析相对的综合方法，通过对事物个性的精确分析，抽象地概括它们的共同特征，形成事物的概念之类；在实践上，“综合研究”更倾向于它的拓展意义，即在现代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烛照下，将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美学思想相互比较并加以辨析，研发出文学的普遍原理或规律，进行跨文化研究；就对象而言，不仅关心文学作品的意义，而且从文、史、哲各个视角出发，研究作品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史学韵味及哲学意蕴，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有机结合，进行跨学科研究。^①

“综合研究”贯穿着一种全面与协调精神，但并非要在具体运用中面面俱到，它正是呼应着研究对象在不同时候不同层次不同场合的特征差异进行自动的耦合。如王蒙曾说过的“概括的代价”一样，“综合研究”也并非“万能钥匙”，当我们从“本体性”的高度完成茅盾文学奖在“共名”方面的审美建构时，“无名”方面的旋律也正期待着从“另类”审美范式中轰鸣而出。

第三节 茅盾文学奖研究的基本设计

以往的茅盾文学奖研究，除了《聚焦茅盾文学奖》^②和《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③开始生成自觉的美学意识之外，其他研究还显得非常零碎，特别是缺乏一种内在的宏观意识、整体意识和比较意识，因而也无法为茅盾文学奖进行恰当的“定位”——它究竟是在同一名称下各种互不关联的作品之集合，还是有着某种内在的血缘而使全部作品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相应的美学特征？我们认同后者，原因在于多个方面。

首先，综述茅盾文学奖的研究现状，对这种研究作出反思和期待。关于茅盾文学奖的生产制度与获奖作品的研究成果不少，除数量不菲的単篇（硕士）论文之外，有的还出版了“作品评论专集”或者“作家研究专

^① 参见蒋述卓、蒋艳萍《论王元化“综合研究法”的文化诗学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6期。

^② 徐其超、毛克强、邓经武：《聚焦茅盾文学奖》，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③ 范国英：《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